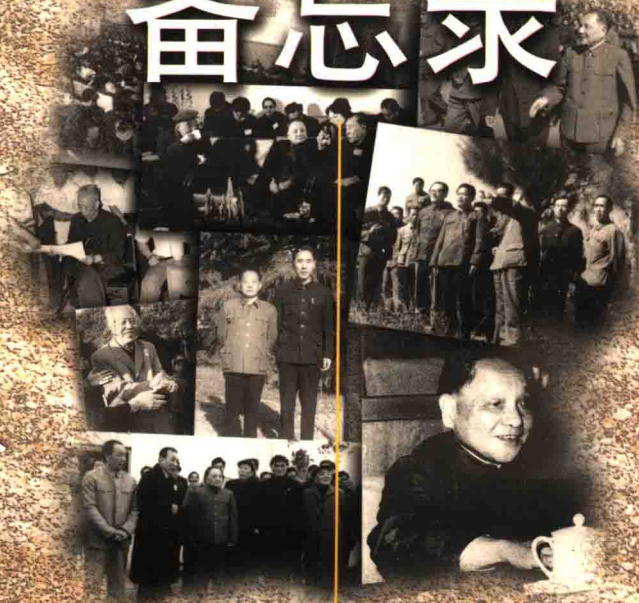


二十年 重大决策 备忘录



主编
龙平平
刘金田
高屹

福建教育出版社

二十年重大决策备忘录

龙平平 刘金田 高 屹 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书 名 二十年重大决策备忘录

主 编 龙平平 刘金田 高 屹

策 划 黄 旭

责任编辑 黄 旭 林炳泰 孙汉生 林春森 沈国才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社长兼总编辑：阙国虬

(福州市梦山巷 27 号 邮编：350001)

文字照排 福建教育出版社排版中心

印 刷 福建省青年印刷厂印刷

(福州新店义井工业区 5 座 邮编：350012)

开 本 850×1168 大 32

印 张 19.625

字 数 475 千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300

书 号 ISBN 7-5334-2667-3/Z·50

定 价 32.80 元

主 编 龙平平 刘金田 高 屹

撰 稿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 昭 王 骏 龙平平 冯 伟

刘金田 李冬梅 高 屹 高 鸣

陶永祥 蒋永青 熊亮华 薛泽洲

前言

转瞬之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首一个世纪中华民族从屈辱到崛起，从贫穷到小康的风雨历程，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由衷地为这20年的神速发展而感叹、自豪。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历史将永远地镌刻着这20年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与辉煌。

中国何以能在短短的20年里创造出如此惊人的奇迹？归结结蒂，在于我们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事关中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正确的重大决策。有了这些决策，中国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策，在古代是指赶马用的棍子，据说一端有刺，能刺马的身体，使它向前跑。策的这一含义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常用，但用它比喻决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确也非常形象。伴随共和国一起走过这20年的人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正是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直接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

历史发展的面貌。试想，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决策，我们就可能还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还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闭门造车”；没有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战略转变的决策，我们可能还在准备打仗；没有包干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现在可能还在为温饱问题奔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决策是社会发展的—种动力，了解现代社会运动，首先就必须了解决策。而决策本身又是一系列社会运动的结果，每一个决策的背后都有着许多事件和人物的活动，正是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活动促成了决策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了解了决策，也就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历史。

策，又有策略的意思，也是人类面临挑战时做出的对策。决策就是在紧要关头做出的重大对策。成功的决策，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可能把一个社会带入一个崭新的境界，不成功的决策，轻则可能使社会停滞、倒退，重则有可能使一个社会走向毁灭。20年来，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说明，我们的一系列决策是成功的。而这些成功的决策背后包含了中华民族在紧要关头的应变能力和高度的智慧。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二十年重大决策备忘录》，正是以20年以来影响中国命运与前途的27个重大决策为载体，用纪实加议论的手法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背景、出台过程、历史演变和产生的深远影响作了深入细致的阐述，它将向人们展现，中华民族和她的杰出代表人物是如何面对挑战，果断决策，使中国在世纪之末抓住机遇，终于赶上了世界前进的脚步，并创造了辉煌业绩的。在这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这样一部作品对于人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无疑会有启迪作用。

本书直接的现实意义在于加深人们对党和国家一些重大决策的理解。我们虽然作出了一些很好的决策，但由于种种原因，人

们对这些决策的理解往往并不是非常全面准确的，这就大大限制了决策作用的发挥。每一个决策的形成都有它的历史背景，有的决策并不是一次形成的，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完善的。如果对这些没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要很好的理解和贯彻各项决策是不可能的。一个决策一旦形成之后，又有自己准确的表述语言，这种决策语言往往以极少的字节浓缩了大量的信息。因此，对这些决策语言也往往需要“解压”、“解读”。如1993年修改宪法时关于国营企业的一段改了一个字，把国“营”企业，改成了国“有”企业，这一个字的变动意义非同小可，如果读不出这一个字的变动所包含的丰富信息，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本书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政策和文献研究的学者，读者将会捕捉到您想知道的内容。

毫无疑问，解“策”绝非易事，除了作者的努力，还需大量借鉴前人的成果。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资料、档案。这里，谨向那些为总结经验，记录历史作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目 录

- 一 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前后后 (1)
 - 历史在徘徊中前进 (1)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5)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9) 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3)
- 二 邓小平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29)
 - 邓小平的访美 (29) 尼克松和基辛格: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两位功臣 (36) 布什访问中国与中美“八·一七公报” (43) 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应该采取主动 (48)
- 三 “包公”升堂——农村改革与农业经济的发展 (52)
 - 第一个农村“责任制”文件的诞生 (52) 三中全会的新提法:可承包到作业组 (56) 农民的伟大创造:家庭联产承包 (62) “政社合一”的历史终结 (68) 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 (73)
- 四 从“杀出一条血路”到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 (79)
 - 马年的出访 (79) “杀出一条血路” (81) 江泽民与经济特区 (83) 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 (86) “我们还要开放海南岛” (92) “上海开发晚了,你们要努力啊” (96)

- 五 理论务虚会纪实** (100)
- 叶帅首倡,胡耀邦“点题” (100) “凡是派”公开检讨 (104) 反对错误思潮,邓小平重申四项基本原则 (107) 肃清“左”的余毒、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补课” (112) 取缔“西单墙”,排除右的干扰 (116)
- 六 平反冤假错案始末** (122)
- 《人民日报》两篇文章激起波澜 (122) 胡耀邦走马上任中组部 (125) 实事求是,拨乱反正 (127) 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130) 陈云关键时刻仗义执言 (132) 中央政治局的九条决定 (136) 昭雪“共和国第一冤案” (138) 平反冤假错案文件备忘录 (142)
- 七 一位老人通过两位西方著名记者的“考试”** (146)
- 法拉奇的两次采访 (146) 华莱士的严格考试 (156)
- 八 震惊中外的历史性大审判** (167)
- 正视历史,邓小平预定审理“两案” (167) 上下同心,49稿终成起诉书 (171) 彭真直言,审判由秘密到公开 (175) 伸张正义,“两案”罪犯依法受审 (182) 依法量刑,“两案”罪犯受到严惩 (189)
- 九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历史决议》一锤定音** (196)
- 一个伟大历史文献的诞生 (196) 舆论反响与评价 (200) 正确评价毛泽东 (202)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208) 两位老人的作用 (212)
- 十 从“小康”目标到“三步走”发展战略** (218)
- “百年图强”是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的主旋律 (218) “小康”目标的提出 (222) “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形成 (228) “部分先富”是一个大政策 (231) 以重点带全局,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 (236)
- 十一 两个精神文明决议的出台** (239)
- 精神文明:新时期的一个新名词 (239) 从“五讲四美”到“全民文明礼貌月” (243) 十二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的系统论述 (245)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 (248) 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

	(251)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精神文明建设在曲折中前进 (254)
	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精神文明再上新台阶 (256) 邓小平
	“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报告: 阐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地位
	(260) 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更加突出
	地位 (264)
十二	香港回归路 (268)
	英国人放出的“试探气球” (269) 两位铁腕人物的较量 (272)
	“二十二个回合” (276) 邓小平情系香港 (280) 世纪庆典
	(283)
十三	国庆大典和小平您好 (290)
	恢复阅兵仪式和国庆大典 (290) 长安街上空此起彼伏的对应声
	(292) 国庆讲话——一份宣言书、一份总结书 (294) 还是“因
	为政策好” (299) 发自内心的喊声: “小平您好!” (303)
十四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308)
	启动中国改革之船 (308)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315) 改
	革是一场试验 (322)
十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确立 (331)
	邓小平说: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331) 江泽民说: “我倾向
	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 (340)
十六	两大转变——中国国际新战略 (348)
	“百万大裁军”, 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348) 对国际形势的新
	判断: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 (351)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 (357) 从战略利益出发调整与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
	(366)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 沉着应付 (369)
十七	“科教兴国”之路 (376)
	中国要发展, 离开科学不行 (376)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383) 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391) 中国必须在
	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396) 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
	(402)

十八 价格改革与抢购风潮 (406)

1987年:涨价中的共识——理顺价格 (406) 经济学家的会诊——涨价不可避免 (409) 高层决策——“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412) 聚焦“闯关”——两派经济学家如是说 (415) 不寻常的岁月——涨价! (419) 激荡的心灵——抢购! (422)

十九 治理整顿始末 (427)

治理整顿由来 (427) 党中央出“重拳”,治理整顿进一步深化 (431) 上下协力,治理整顿成效显著 (436)

二十 江泽民出任总书记 (442)

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 (442) 不负重托,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 (446) 两代领导“核心”顺利交接,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前进 (452)

二十一 邓小平南巡纪实 (463)

在武昌,邓小平纵论“左”和右 (464) “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 (465) 珠海之光 (470) “等你们更发展了,再来麻烦你们” (475) 邓小平的上海情结 (477) 邓小平情系十四大 (479)

二十二 姓“社”姓“资”有了新说法 (482)

姓“社”姓“资”起波澜 (482) 邓小平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 (484) 轰动一时的“皇甫平” (487) 邓小平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491) 加快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再上新台阶 (497) 排除“左”的干扰,市场经济写入十四大报告 (499)

二十三 邓小平同志治哀活动纪实 (503)

噩耗惊梦 泪满九州 (503) 长街送别 小平走好 (508) 汽笛哀鸣 万众垂首 (514) 港澳治丧 游子诉情 (518) 全球志哀 五洲同悲 (524) 骨灰撒大海 鲜花送伟人 (528)

二十四 二十年反贪纪实 (533)

“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 (533) 两手抓,两手都

	要硬 (541) 廉政建设新起点 (547) 更大的力度,更大的决心 (552)
二十五	中南海情系老少边穷 (559)
	第二代领导集体与开发扶贫之路 (560) 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创 脱贫致富新阶段 (566) 世纪之交的扶贫攻坚战 (570)
二十六	党章上的新名字——邓小平理论 (578)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 (578) 邓小 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的确立 (580) 邓小平理 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583) 在社会主义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世纪的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 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585)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 (587) 在当代中国,只 有邓小平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589)
二十七	跨世纪的领导集体 (592)
	巨星殒落 路在何方 (592) 跨世纪的宏伟纲领 (596) 九易 其稿的大会报告 (599) “处处为人民谋福利” (603) 两项重 要的成果 (605) 跨世纪的领路人 (608)

一 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前后后

历史在徘徊中前进

1976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头?全国人民经历了空前的感情波涛。大悲: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政治巨人相继逝世和几十万人丧生于唐山大地震;大愁:“反革命”帽子满天飞,人人自危的“文化大革命”将何时了?如何了结?大喜:10月6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全党和人民的意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没费一枪一弹就逮捕了被称之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从而结束了令人窒息的“文化大革命”。

粉碎“四人帮”,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喜庆之余,面对着这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人们热切期待着拨乱反正,热切期待着华国锋能带领大家走出这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然而,得到的回应则是积重难返。中国这条巨船仍然朝着原定的方向缓慢地徘徊着。

尽管华国锋在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尽管华国锋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振兴中华民族，但是，历史的限制和思维的定势，使他难以托起这千钧重担。

华国锋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毛泽东迅速提到领袖位置上的。

1959年7月，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6年10月，华国锋任湖南“欧阳海”灌区工程党委书记兼总指挥。

1967年8月，华国锋参加筹建湖南“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968年4月8日，华国锋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0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恢复，党中央任命华国锋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2年，华国锋经毛泽东提名，任公安部部长。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并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筹备中共“十大”。

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举行，华国锋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周恩来逝世，华国锋由毛泽东提名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点名批判，并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4月，华国锋由毛泽东提名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逝世前亲笔书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将接班人的重担交给了华国锋。

10年,仅仅10年,华国锋就在毛泽东的提拔下,从副省级干部走上了权力的顶峰——毛泽东的接班人。

华国锋的一步步升迁,以至成为全党的最高领袖,的确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所使然。在国人还不十分了解他的时候,在他还没有练就管理一个非常时期国家的能力的情况下,他就被提上了毛泽东接班人的位置。因此在当时,他除了借重毛泽东的威信,自觉地、有意识地以毛泽东的最好学生来认定自己,接过毛泽东的旗帜,继续毛泽东当时推行的政治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外,他又可能有什么别的方法立足中央,管理国家呢?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汇报时指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小平。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即10多年来被视为神圣的“二报一刊”发表了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方针。一个月后,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这个方针,其实质就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路线延续下来。

华国锋的这些行动告诉人们,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照过去方针办”,只能依靠“两个凡是”。华国锋的这些做法犹如一盆冷水泼向人们喜庆的心头,人们的心又收缩了、下沉了。人们不愿意历史定格在“过去”方针中,发出了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在1977年3月10日至2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言说:“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

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的；(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王震发言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邓小平。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他们的发言虽然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却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这使华国锋的讲话基调也不得不有所松动。

华国锋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是其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对邓小平同志的功过，毛主席早有明确的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工作，解决邓小平同

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总之“问题正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在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5日中央曾就此问题发出过通知,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的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显然,华国锋竭力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没有改变。然而,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这一方针与他想结束“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的目的是相悖的。思想路线不改变,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都难以顺利进行,在“两个凡是”的旗帜下,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无疑是缘木求鱼。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面对在“两个凡是”方针的指导下,各方面拨乱反正工作举步维艰的局面,党内外许多同志毅然起来抵制“两个凡是”这一无形